

美国人精神历史中的圣地情结

李秀珍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在美国人的精神历史中,“圣地”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主要表现:一是自殖民地时代清教徒就渴望建立“圣经共和国”,对圣地的依恋延伸进美国的信仰、政治和教育之中;二是在美国人看来,希伯来语是圣语,是终极价值的承载者,它把锡安和美国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是各种背景和文化取向的美国人都忠诚于锡安,美洲被视作锡安山的化身。正是这种浓重的圣地情结,使得美国在19世纪犹太人回归和圣地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与以色列建国后保持特殊关系的一个内在原因。

[关键词] 美国;以色列;圣地;圣经;希伯来语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08)03-0088-05

长期以来,在国内对美国与中东关系的研究中,美以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学者对这一问题在结论上基本没有异议。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以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美国始终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大家更感兴趣的是,美以关系特殊的原因何在?有的学者从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利益中地位的角度,有的从美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以色列的认同感角度,有的从美国犹太人政治势力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角度加以分析,最终殊途同归,得出“美以关系特殊”的结论。笔者试图以美国人精神历史中的圣地^①情结对美以关系进行解析。

自从欧洲移民定居美洲大陆开始,“圣地”的概念就渗透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之中。17世纪殖民地时代,清教徒就渴望建立一个圣经共和国(a biblical commonwealth),美洲被视作锡安山的化身,各种背景和文化取向的美国人都忠诚于锡安,对圣地的依恋延伸进美国的家庭、信仰和教育之中。

为厘清历史上圣地思想对美国人精神的影响,本文选取圣经、希伯来语言、圣地锡安三个角度加以分析。

一、圣经

自16世纪北美沦为殖民地起,《圣经》一直是北

美各地阅读最为广泛的书籍,它不仅影响到其信仰,而且对其政治、制度设计、地方命名、甚至个人意识的影响随处可见。

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生活在数十世纪之前古以色列的先知和信徒、国王和平民都被演义为现代角色。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把他们的政治条件描述为“埃及奴隶制”;英王乔治三世是法老,大西洋是红海,华盛顿和亚当斯是摩西和约书亚。独立战争暗含的目的就是犹太人出逃埃及的再版。杰斐逊说:“法老坐在一辆敞篷战车上,头戴王冠,手握长剑,劈开红海滚滚波涛,追杀犹太人。这时,乌云中射出一缕火光,表明神的存在,光芒照到站在岸边的摩西身上,他手臂伸长越过红海,战胜了法老。”^[1]独立战争对暴君的反叛是顺从神意。

清教徒对圣经思想的认同还渗透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之中,推动了“契约神学”原则在政治制度中的确立。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B·莫里斯(Richard B Morris)指出的:“这条契约神学……是政府民主政治的基石……建立于人民同意之上的政府,清教领袖坚持它一定就是符合神意的政府。”^[2]哈佛大学校长塞缪尔·兰登(Samuel Langdon)指出:“根据最初的章程,按神意建立起来的犹太政府,如果仅从民众的观点

[收稿日期] 2007-09-26

[作者简介] 李秀珍(1969-),女,江苏徐州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① 圣地,指巴勒斯坦,包括今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约旦。

看,是一个完美的共和国……每个民族,当有能力和被同意时,都有权建立任何形式的最有助于实现他们福祉的政府。以色列的政体毫无疑问是一个范本;除了一些特殊的东西,至少它一些主要的法律命令可以被现代政体复制。”^[3]

《圣经》的影响还明显地反映在美国地图上。美国成百上千个地名来源于《圣经》^[4],不仅在《圣经》中多次出现的伊甸(Eden,创2-4章;结27:23;28:13;31:8;王下19:12;赛37:12)、迦南(Canaan,创10:19;11:31;12:5;13:12;16:1;出34:10-15等)、希伯伦(Hebron,创13:18;23:1;35:27;37:14;49:31;民13:22)、西奈(Sinai,出3:1;18:5;19章;申33:2;士5:5)^①等,被无数地方用以命名;就是在《圣经》中仅提及1次的以琳(Elim,《出埃及记》第15章第27节)、艾(Ai,《约书亚》第8章第18节)也成为内布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的地名;锡安(Zion)和萨勒姆(Salem)两个地名使用得尤其多,美国许多州如阿肯色、伊利诺斯、艾奥瓦、肯塔基、马里兰、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新泽西、北达科他、宾夕法尼亚、南卡罗来纳、犹他和弗吉尼亚至少有15个地方叫锡安;不少于27个城镇、城市和县叫萨勒姆,仅新泽西就有一个城市和一个县都叫这个名字。的确,看看美国的“圣经”地图,就可以感觉到创业者对构成其精神传统的圣经渊源是多么熟悉。

《圣经》的思想和人物形象更是充满了早期建国时美国人的意识。一个人从孩童时期就读《圣经》,长大后,《圣经》往往成为他们的人生向导,有时甚至是职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孩童时期的训练和其后从事的职业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如19世纪的美国考古学家埃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 1794-1863年)。他是对圣经地理学和考古学作出重要贡献的第一位美国学者。他的三卷本的著作《巴勒斯坦、西奈山和阿拉伯派垂耶圣经研究》,“打开了通向新的地形学和历史学发现的道路,基本上改变了人们有关19世纪巴勒斯坦的地理知识……成为19世纪探险的基石,任何希望了解那一时期巴勒斯坦的人都必须读他的书。”^[5]罗宾逊在书中写道,他的科学动机来源于对圣经的热爱。“在我乡下的大部分时光中,尤其在新英格兰,《圣经》的场景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以后这种感情升华为一种强烈的渴望,一定要亲身去拜访那些给人类历史打下深刻烙印的地方。的确,这种感情也许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新英格兰影响更为广泛;没有一个地方《圣经》如此广为人知,或得到如此高度的表扬。一个孩子从记事起就不仅习惯于自己读《圣经》,他还在家中的早晚祈祷中、每天

的村庄学校、主日学校和圣经班、教堂的每周宗教仪式上诵读或听到。因此,当他长大成人后,西奈、耶路撒冷、伯利恒、特许之地已经在他的童年记忆中最神圣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在我的例子中,所有这些后来成为了科学动机……”^[6]

1976年,霍华德大学学者劳伦斯·琼斯在一次“黑人的圣地观”中演讲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圣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我记得长大后我们甚至不敢在《圣经》上写字。当我上神学院时,教授告诉我‘写在页边上’,对我来说拿起铅笔在《圣经》上写字是一个真正充满创伤的经历。父亲总是说,即使一本《圣经》破旧了,你也不能破坏它或扔进垃圾桶,你要烧掉它。它是神圣的,书本身是带有一种神圣感的。”^{[7]57-62}

许多美国人就是这样表达他们个人记忆和家庭记忆的。因此,无论是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圣经》是“神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还是伍德罗·威尔逊所认为的《圣经》是“人类灵魂的大宪章”,这些都表明圣经已经和美国民众不可割离。

二、希伯来语言

从美国本土文化形成之初,希伯来语就不是一种外来语言。我们从美国的神学和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在美国人看来,希伯来语是圣语,是终极价值的承载者,它把锡安和美国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人甚至曾设想把希伯来语作为美国的正式语言^{[7]16}。

美国人和希伯来语之间的联系是清教徒17世纪建立起来的,他们视自己是《圣经》的复兴者,而《圣经》最早的版本就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当时马萨诸塞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在他的《普利茅斯种植园的历史》中写道:“虽然我长大了,但我一直渴望亲眼看看,那门最古老的语言、神圣的语言(能够书写法律和圣谕、远古时代神和天使用它与先知交流,给新创之物命名)。虽然我懂得不太多,但我还是要瞥一眼。我的目标和渴望是,看看字词和句子是如何躺在圣典里的……”^[8]可以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美国人对希伯来语的研究一直严格地限制在

① 文中缩写均为《圣经·旧约》各卷名: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书),士(师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诗(篇),(雅)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阿)摩(司书)。“结27:23”是指《以西结书》第27章第23节,“创10:11-12”指《创世纪》第10章第11节至12节。参考马自毅编著《圣经地理》,学林出版社,2005年。

神学的框架内。

19世纪初,希伯来语逐渐从严格的神学研究领域突围^[9]。这一时期“神学院和师范学院里的学者用拉比犹太教时期的希伯来文书写各类书籍,内容涉及《圣经》、《塔木德》、中世纪诗歌、哲学、历史、法典、辞典编纂和目录学。”^[10]¹⁶⁵如1833年,犹太教徒、希伯来语言学家乔舒亚·塞克斯(Joshua Seixas)出版了《希伯来语法初学者使用手册》,并坚持在美国数所高校教授希伯来语。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任院长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也是一位希伯来语学者,他认为希伯来语“对于绅士的教育至关重要”,因而要求学校的所有教师都要了解希伯来语^[11]。当时,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规定希伯来语为必修课,宣称如果毕业生对希伯来语这门神圣的语言完全一无所知,当他进入天堂时将会感到羞耻^[12]。

因为希伯来语既是一门语言,又是宗教情结的承担者,所以它的重要性大为提升。1840-1865年间,美国许多市镇都传授希伯来语。一个市镇的拉比^①往往也是该镇的希伯来语老师,他们单独或者在教室集体教授学生,另外,还有其他四类学校,即午后学校、全日制学校、私人学校和犹太星期日学校也教希伯来语^[10]⁷⁹。1883年,希伯来语言文学协会在芝加哥创立,1917年,全美55所高校设置了希伯来语课程^[13],1920年,出现了20多种希伯来语期刊,年轻人有了希伯来语演讲俱乐部。美国在随后的几十年出现了规模不大但却充满活力的现代希伯来文学运动,这些文学运动多是由一些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促成的。“以色列国的出现,破坏了美国的现代希伯来文学运动,因为除极个别的例外,所有杰出的文学家都移居以色列。”^[10]¹⁶⁷

三、圣地锡安

美国人历史上对圣地锡安的情感在《圣经》之外往往借助于两种重要的方式表达:一是文学作品,尤其是朝觐文学;二是和个人及团体的实际定居。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回溯到美利坚民族的早期。

朝觐文学是美国人与圣地历史中一座未开发的富矿。对于大部分基督教新移民来说,不论是学者、小说家,还是传教士、旅行者,鼓舞他们的往往是坐在妈妈膝上听来的有关锡安和耶路撒冷的宗教教义或故事,因而他们写出了各种形式的圣地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沉思、渴望和梦想^[14]。

20世纪中期,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亚特兰大习俗》

(Atlanta Constitution)的编辑拉尔夫·麦吉尔(Ralph McGill)在《重访以色列》(Israel Revisited)一书中作了这样生动的描写:“我,一个男孩,出生在一个信仰长老会的村子里……长大后,我知道了古老的圣歌,那里有‘暴风骤雨的约旦河堤岸’、加利利和‘金色耶路撒冷’,它们在安息日和祈祷会上被诵唱。从一个小男孩起,我就梦想有一天能够看见耶路撒冷的金顶和加利利海的蓝色河流。……我的祖母是一位长老会信徒,一生渴望看到圣地。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她常常走到我们在东田纳西农舍前面的走廊,目光越过草地稻田,对着田纳西河沉思道,‘孩子,我们已经跨过一条又一条河流……跨过了约旦河。’我知道她在说着想象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所有长老会信徒有一天必须横越约旦河。但无论如何,地中海那块古老土地的吸引力植根于作为一个孩子的我的心中。”^[15]

然而,当19世纪美国旅行者真正来到圣地时,大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著名的耶路撒冷,历史上最高贵的名字,已经完全失去了古代的辉煌,变成了一个贫困的村庄……”“巴勒斯坦在悲切地忏悔。”这些不是引自《哀悼书》,而是马克·吐温《海外无辜之婴》(The Innocents Abroad)^②里的句子。马克·吐温1867年在欧洲和圣地的旅行,目睹了圣地的惨象,感到十分震惊,幽默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16]⁹⁸。

即便如此,许多人依然坚持梦想。美国基督徒对圣地的忠诚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倾向。每个人不仅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看圣地,而且通过他们出生和成长地宗教传统的角度来看圣地。马克·吐温评论道:“根据我所读过的书进行判断,我确信过去一些年访问圣地的许多人都是长老派信徒,他们是来寻找支持自己信念的证据的;他们发现了一个长老会的巴勒斯坦,热情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已经决定不再找别的地方,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它。其他是浸礼会信徒,寻找浸礼教证据和一个浸礼教的巴勒斯坦。还有天主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圣公会教徒,他们都在寻找能够捍卫他们信念的证据和一个天主教徒的巴勒斯坦、一个卫理公会的巴勒斯坦、一个圣公会的巴勒斯坦。尽管这些人意图简单,他们还是充满了偏好和偏见,带着已有的定见进入圣地……我们的移民教徒各有自己的看法。”^[16]²⁴³

19世纪,对圣地的依恋使得一些美国团体和个人

① 拉比(Rabbi),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② 无辜之婴(the Innocents),希律王为企图杀害刚诞生的耶稣而屠杀的无辜婴孩。

试图定居在圣地,但大部分都失败了。美国人从此也认识到超越个体利益,集体开创的重要性。1852年,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沃德·克雷森(Warder Cresson)^①试图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埃姆克雷费姆(Emek Rephaim)建立一块农业聚居地^[17]。克洛琳达·迈纳(Clорinda Minor)在现在位于特拉维夫地区的土地上创建了另一块聚居地“希望山”(Mount Hope)^[18]。1866年,美国人乔治·琼斯·亚当斯(George Jones Adams)和来自缅因州的150名移民来到雅法(Jaffa,现位于以色列境内)定居^[19]。19世纪的后半叶和20世纪初,美国移民努力在圣地扎下根来。伯莎·斯帕福德·维斯特(Bertha Spafford Vester)3岁时被带到耶路撒冷,她在《我们的耶路撒冷》一书中记录下了耶路撒冷美国犹太人聚居地的历史^[22]。

美国犹太人定居圣地的计划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锡安山热爱者”(Hibbat Zion)运动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期间,从美国移民到圣地的犹太人只是美国犹太人社团的一小部分,但这一活动持续不断。20世纪初,一小群来自新泽西伍德拜因(Woodbine)犹太农学院的学生启动了一个定居计划,这一计划后来通过其创建者之一埃利泽·贾菲(Eliezer Jaffe)的倡议,发展成为第一个小股东的合作社式的定居点纳哈拉(Nahalal),位于杰兹里尔(Jezreel)河谷。圣地的美国犹太人定居点工作也因艾科扎(Achooza)购地公司和美洲锡安共同体的创立被促进。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给未来到圣地定居的移民准备宅基地和耕地。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美国犹太人中间掀起一股定居圣地的热潮,许多理想主义者都希望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为范本,展示他们所信奉的美国价值观,日渐壮大的“伊休夫”(注:犹太社团)在寻求实现这些价值观^[21]。

美国人骨子里这种普遍而坚定的圣地情结是美国在19世纪犹太人回归和圣地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内在原因。笔者认为,就是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才会有约翰·亚当斯总统的表示“我真的希望犹地亚(Judea)的犹太人再度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②,才会有美国新教徒对圣地重建的普遍兴趣,甚至天主教徒、摩门教徒也行动积极^[22]。

曾在马里兰州犹太人平等方面作出贡献的天主教徒托马斯·肯尼迪,在1818年名为“犹太人比尔”的演讲中宣称:“如果我们在行为和信念上是基督徒,我们必须相信在神的庇佑下犹太民族将再度重建。从亚伯拉罕时代到今天,这个神奇民族的故事充满了趣味和教诲。他们第一次迁移到埃及,之后又离开,穿越红

海,行进荒野,定居迦南;他们囚禁巴比伦,之后回国重建,又最终离散,构成一个永不枯竭也不能枯竭的主题。他们从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现在虽然散居各地,但他们未来的国家毫无疑问比以前更辉煌……曾率领他们父辈穿越沙漠的人,许诺要再度率领他们回到祖国的土地……可能时间不会太遥远,犹太国将会建立。”^[23]1841年10月,美国摩门教徒奥尔森·海德(Orson Hyde)到达耶路撒冷,祈祷犹太人收复土地。

在犹太人遭受屠杀和陷入险境的1882年^③,美国更加关注犹太人的困境,关注用犹太复国主义的办法解决其困境的紧迫性。曾创作自由女神像铭文的艾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阐明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她早在美国和欧洲其他人之前就意识到,圣地是犹太难民唯一可能的目的地,是犹太民族的天堂^[24]。众议员塞缪尔·萨利文·考克斯(Samuel Sullivan Cox)也在这一年一篇“同时代的人”社论中明确提出:耶路撒冷和犹太人彼此相属。“在历史的极度辉煌之中,一个人会油然而产生一种感觉,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城市。基督徒为其圣地而战并掌控了圣地;穆斯林在其他所有目光之下捍卫大卫和所罗门之墓;摩利亚山(Mount Moriah)圣殿遗址上矗立着奥马尔(Omar)和阿克萨(Aksa)清真寺;如果说有一个实体和一个民族紧密相连,那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太民族。”^[25]

20世纪以后,美国先是参与炮制了《贝尔福宣言》,在巴黎和会上企图把巴勒斯坦作为美国的委任统治地;后又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把世界犹太人大会由伦敦移至纽约,筹划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在以色列建立后,美国率先承认,并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多次战争中给予以色列强有力的支持。时至今日,美国在中东冲突中的亲以立场依然未变。所有这一切,我们也许可以从美国人的圣地情结中找到一个说法。

① 沃德·克雷森在美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狂热的宗教人物。1844年,他在一本名为《耶路撒冷,世界中心和犹太人上帝荣光之受赠者》的小册子中宣言,上帝将通过犹太人实现对世界的许诺,为此目的犹太人将再次集聚圣地;同一年,他到耶路撒冷朝觐,并希望成为美国驻耶路撒冷第一任领事。1844年5月17日,克雷森被任命为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但6月22日这一任职就被取消。当时克雷森已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抵达耶路撒冷后,他相信自己已是领事。1846年,克雷森“辞去”领事职位,并于1848年3月28日改信犹太教,取了一个希伯来名字 Michael Boaz Israel。

② 1819年,约翰·亚当斯总统写给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之一莫迪凯·曼纽尔·诺厄(Mordecai Manuel Noah)信中的话。这是美国政治家第一次宣称赞成在圣地建立一个主权犹太国。

③ 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遇刺,俄国犹太人因被指控参与谋杀,而遭到疯狂屠杀,造成1882年犹太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浪潮。

[参 考 文 献]

- [1] Julian P, Boy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I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494-495.
- [2] Richard B. Morris.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Jewish Tradition in Early America [J].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1956, 9 (1): 20-25.
- [3] Truman Nelson. The Puritans of Massachusetts: From Egypt to the Promised Land [J]. Judaism, 1967, Spring (2): 204-208.
- [4] Lottie and Moshe Davis. Land of Our Fathers: Guide to Map of Biblical Names in America [M], New York: Associated American Artists, 1954: 45.
- [5] Yehoshua Ben-Arieh. The Rediscovery of the Holy 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Jerusalem, 1983: 85, 90.
- [6] Edward Robinson. Biblical Researches in Palestine, Mount Sinai and Arabia Petraea I [M]. Boston: Crocker & Brewster, 1941: 46.
- [7] Moshe Davis. With Eyes Toward Zion I [G].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57-62, 16.
- [8] Isidore S, Meyer. The Hebrew Exercises of Governor William Bradford [M]. Plymouth, Mass.: Pilgrim Society, 1973: 31.
- [9] William Chomsky. Essays in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G]. Cincinnati: American Jewish Archives, 1958: 123-145.
- [10]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 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 [M]. 杨波,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65, 79, 167.
- [11] Isidore S, Meyer. Essays on Jewish Life and Though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359-374.
- [12] W Willner.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8 [R]. 1900: 119-126.
- [13]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1917-1918) [R]. 1919: 406.
- [14] Jesse Lyman Hurlbut. Traveling in the Holy Land Through the Stereoscope [M]. New York: Underwood & Underwood, 1900: 12-13.
- [15] Ralph McGill, Israel Revisited [M]. Atlanta: Tupper & Love, 1950: 1-2.
- [16] Mark Twain. The Innocents Abroad [M]. Hartford: American Publishing, 1869.
- [17] Isidore S, Meyer. Early History of Zionism in America [M]. New York: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and Theodor Herzl Foundation, 1958: 1-20.
- [18] J E Hanauer.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olonisation [G]. Quarterly Statement of the Palestine Exploration, 1900: 128-132.
- [19] Shlomo Eidelberg. The Adams Colony in Jaffa 1866-1868 [J]. Midstream 1957, Summer (3): 52-61.
- [20] Bertha Spafford Vester. Our Jerusalem: An American Family in the Holy City, 1881-1949 [M]. New York: Doubleday, 1950: 567.
- [21] Compare Felix Frankfurter. The Palestine Situation Restated [J]. Foreign Affairs, 1931 (4), esp: 412.
- [22] Robert T, Handy. Studies in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Holy Land [J].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1971 (13): 290-302.
- [23] E Milton Altfeld. The Jew's Struggle for Religious and Civil Liberty in Maryland [M]. Baltimore: M. Curlander, 1924: 22.
- [24] Emma Lazarus. An Epistle to the Hebrews [M]. New York: Cowen, 1900: 73-74.
- [25] Samuel Sullivan Cox. Orient Sunbeams, or From the Porte to the Pyramids, By Way of Palestine [M].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2: 295-296.

(责任编辑:冯 蓉)

Holy Land Complex in American Spiritual History

LI Xiu-z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e Holy Land complex is integral to the American spiritual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he Puritans have aspired to build a biblical commonwealth. Attachment to the Holy Land has extended to American faith, politics and education. For Americans, Hebrew is the Holy Tongue, bearer of eternal values, which has brought Zion close to the basic elemen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Despite the background and culture, Americans are loyal to Zion, and America itself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mbodiment of Zion. It is because of the Holy Land complex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layed a strategic role in the return of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oly Land. Also, it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spec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Key words America; Holy Land; the Bible; Hebrew; Zion